

# 医疗市场放开不等于“放纵”

■ 黄春景 职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通知》要求,在放开价格的同时,要加强对医院价格行为的监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4月9日发改委网站)

放开民营医院定价权,完全让市场竞争,有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看病吃药越来越贵的现象。其实这只是一主观臆想,未必会出现此等反弹现象。如果我们的医疗服务改革到位,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在医疗服务领域中也有竞争择优的机制,那么谁单独要想把医疗价格抬高,多掏消费者的

腰包,想必难以做到。须知,医疗市场放开不等于“放纵”,竞争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当国内优胜劣汰的医疗市场正在形成,这对于整个医疗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

首先,医疗市场全面放开,可以让民营诊所与公立医院在同一平台上展开服务质量及医疗水平的竞争。同时,也可通过市场淘汰一批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差的小诊所,让市场自然地“优胜劣汰”。早在1982年,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的请示》,私人诊所和联合诊所在全国各地兴起;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58号文),文件放宽了社会资本的准入范围,鼓励多元化办医格局。这30年间,国家相继出台了10条鼓励民

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的政策,这说明了政府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办医,乃是大势所趋。

其次,医疗市场全面放开,剧增的民营诊所对公立的大医院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两者之间扮演互补关系的角色没有变,老百姓“大病进医院,小病到社区”的就医观念还是一贯的。民营小诊所的增多,只会有利于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推进医疗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各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目前国内的医疗资源分配还不太公平,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和大医院,广大的基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公共设施不够健全,尤其是对重大疾病的防御和处理明显不够。如果民营诊所能够参与互动,则有利于搅活医疗市场的“一池春水”。

再者,医疗市场全面放开,有利于弥补政府在医疗领域投资上的短板,更重要一点,可以有效制衡公立医院,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局面,通过公平、充分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目前,公立医院一方面在追求盈利,另一方面又享受免税和政府补贴;而民营医院既要缴税,政府也不给补贴。因此,我们的政策和管理亟需向公平靠拢,既不能放松了对公立医院的监管,也不能限制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所以说,打破公立医院的“一家独大”,全面放开医疗市场,显得很有必要。

当然,全面放开医疗市场,产生这样那样的顾虑和担忧还是存在的。医疗服务是特殊行业,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一旦放开民营医院定价权后,难保一些利欲熏心

的人不择手段,干出损人利己的勾当。对此,在放开民营医院定价权后,监督的难度肯定会加大,有关职能部门在这方面要打好“预防针”,加大监督力度和打击力度,维护医疗市场的秩序,保持和治理性的竞争态势。

一言概之,医疗市场的全面放开,并不等于“放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由此而看,医疗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对于当下而言无疑是好事一桩,因为放开了竞争,可以通过让“点菜”者自己“埋单”的特殊手段,让医疗这一特殊市场的“节拍”回归正常,医药卫生事业才能健康、快速发展,看病贵看病难才能有望得以解决。

# “央企豪楼”背后的真问题

■ 吴江 自由撰稿人

中央三令五申严控楼堂馆所建设,作为央企的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网公司)在原有两栋办公楼能够满足生产办公需要的情况下,又以建设“广东电网生产调度中心”的名义,投资21亿多元,于今年2月开工新建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并且新建办公楼内竟规划设计多个高档健身房、娱乐活动中心、礼堂、高档餐厅等设施。(《京华时报》4月10日)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对企业而言,自己挣来的钱,究竟怎么花,要说有权自己说了算,市场自然会对企业花钱方式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广东电网投资21亿兴建办公大楼,其手笔的确远超一些政府大楼。不过,五星级写字楼其实早已并不稀奇,世界知名企业不惜重金打造总部大楼,更是不乏先例。

例如,被乔布斯称为“世界上最好办公楼”的苹果公司新总部大楼,其造价约

为50亿美元;而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办公楼,不要说康乐健身设施,甚至连宠物培训所、游泳池、攀岩馆、餐厅、影院,你想到想不到的,人家都统统实现了。而这些公司筹划中的新总部,则将顶级餐厅、公园、超市都纳入规划,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办公楼的想象。而公司在办公楼上如此舍得投入,绝非“土豪式”烧钱,在用作公司总部的同时,也在彰显这些企业的创新灵魂与基因,连办公场所都可以开创新无限可能,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企业的创新?而工作环境对于员工多元化需求的不吝投入,当然会获得员工的认同并以“拼命工作”作为回报,这个回报率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恐怕同样相当可观。

可见,企业办公大楼规划有健身房、活动中心甚至高档餐厅,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为员工创造舒适而有创意的工作环境,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与工作激情,对于以创新为生命力的企业而言,未尝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相形之下,广东电网21亿兴建五星级办公大楼,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央企

的豪华办公大楼,显然并不意味着这家央企瞬间具备了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基因。恰恰相反,作为央企其实并不能因“财大”便“气粗”,央企的巨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政策性的垄断得利,这些利润自然没有理由不经央企出资人或股东的授权,便大手笔的用于央企办公楼的豪华升级与重建。

之所以中央禁令仍然难禁央企的豪华办公楼,与其说是央企顶风作案,毋宁说更需反思央企利润上缴的不足与监管的缺位。比央企经济效应更重要的其实是社会责任,政策性央企更应通过上缴红利充实社保基金,搭建公共研发平台,推动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回馈社会。而现实中,尽管央企上缴利润提高后,各类别央企向国资委上缴其利润的10%-25%,但与欧洲国家50%的上缴比例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而就是这点利润往往还通过多种渠道回流央企。

一言以蔽之,央企上缴红利过低,留存利润过多,再加上利润使用的监管失控,才是刺激央企豪楼疯狂生长最浓烈的兴奋剂。

# 治霾不能“宠惯”重点工程

■ 李英锋 律师

4月9日,湖北武汉市环保局向媒体通报治霾工作进展情况,通用汽车、东风雷诺、园博园、三环线北段和西段改造等重点工程,因工地扬尘严重,首次被点名批评。“过去重点工程工地内扬尘污染,都是内部通报,但整治效果并不理想。”武汉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说,现在不行了,不动真格,没法向市民交待。(4月10日《武汉晚报》)

针对一些重点工程扬尘严重的问题,武汉市把内部通报改为公开批评,看似是一种进步,而实际上,只是一种正常监管姿态的回归,是一种应然的动作。

治霾不分三六九等,不分重点工程与普通工程。重点工程扬尘严重与普通工程扬尘严重的性质是一样的,也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从一开始,监管部门就不应该“惯着”重点工程,不应该顾及重点工程的脸色,而是应该用公平的尺度来对待重点工程,该怎么批就怎么批,该怎么罚就怎么罚,该怎么整顿就怎么整顿。这样,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当前,很多地方雾霾严重,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影响了民众的幸福指数。民众迫切希望环境能够尽快改善,空气能够尽快变得干净安全,迫切希望能够自由

自在地开窗,自由自在地外出,自由自在地呼吸。在这种民意压力下,政府必须要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诚意来治理雾霾,在全面治理的基础上,要敢于啃“硬骨头”“难骨头”,敢于向重点工程开刀。一方面,重点工程往往意味着大投资、大就业、大税收、大GDP,与一座城市的综合利益以及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另一方面,重点工程也可能是大排放源、大污染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给民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重点工程的矛盾性,如何处置重点工程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就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发展观和执政能力。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重点工程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关系,不能为了片面追求发展利益就放松对重点工程的监管,就迁就重点工程的环境污染等行为,就不敢撕破脸皮、不敢用硬手段。显然,宠惯重点工程的思维是错误的,必须得到纠正。

笔者以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重点工程不但不应该“厚爱”一层、重点照顾,反而应该严管一层、重点监控,应该对重点工程采取更苛刻的标准和措施,让重点工程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这样的重点工程才能向环境释放最大的正能量,才配得上“重点”二字,才是民众需要的重点工程。

# “比尔·盖茨呼吁中国富豪多做慈善”启发了谁

■ 一叶 职员

比尔·盖茨呼吁中国富豪多做慈善,别只懂奢侈品。中国的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他近日接受采访时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4月9日《华商报》)

对于慈善这点事儿,比尔·盖茨很有发言权。他不仅富可敌国、多次蝉联世界首富,同时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慈善家。他具体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善事,恐怕很难给出具体数字——他一直不停地在捐,捐款数额不断被自己刷新。况且,像比尔·盖茨这样把做慈善当成自己生活和事业一部分的人,已无需纠结具体的捐赠数额,重要的是永葆那份善心,并从中得到满足和慰藉。

比尔·盖茨呼吁中国富豪多做慈善,既是善意的提醒,也是委婉的批评。毋庸讳言,中国某些富人富则富矣,惜乎富的只是口袋,而非“脑袋”,更非心灵。他们更热衷于享受金钱和物质所带来的生理快感,如果说也有一些心理层面的追求,则更多地体现在虚荣心等低层次阶段。抢购奢侈品、婚嫁嫁娶奢靡无度等等,都是典型表现。有的还跑到国外去炫富,一副暴发户的浅薄嘴脸,令人侧目。而将财富留给后人的传统小农意识,让这些富人成了守财奴。比尔·盖茨也是富人,并且是世界上首富的富人之一,他的呼吁或许可以给某些小富即安甚至不可一世的富人们带来启发:该如何对待财富?该如何摆正心态?怎么花钱是个人的权利,但怎么花钱同时也足以体现出人的品味和道德素养。跟买奢侈品等个人享受比起来,做慈善是更高尚行为,能带给人更高层次的心灵愉悦。

西方流行一句话: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富翁,但是要培养一个绅士却要三代

人的努力。某些中国富人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同时,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多做慈善,不仅需要富人们提高自身素质,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法制的保护。一方面,要制订经济方面的激励政策来引导富人做慈善,比如免税或减税等;同时,更要保证慈善事业的公开透明和严格监管。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成熟的慈善文化,更有着发达的慈善机构和完善的配套制度,公众捐款不必担心自己的善款不能被善用。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欠缺的。我的捐款有多少真正用到了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善款支付了相关机构的巨额“管理费”?拿到善款,相关地方是为老百姓办实事了还是兴高采烈地采购豪华越野车去了?……这些疑问都让某些中国人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不敢做善事、不愿做善事。完善慈善制度、加强慈善管理,将慈善事业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理性化的正常轨道,慈善事业才能释放活力,包括富人们在内的所有人的爱心才能有处安放。

## 戏画闲言

### 名为招商实旅游 严禁!

■ 吴之如·文并画

《经济参考报》报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活动。借着招商便利,顺势途经旅游热地的行为被严厉禁止。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招商引资是各地增强自身活力、快速发展地方经济并造福当地百姓的一大有效途径。只要思路开阔,规划得当,坚决执行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充分考虑地方的长处,尤其是兼顾经济、环境和各方面的效益,那么,无论招来外商内商,引进的是外资还是内资,都是越多越好。这样的招商引资,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做大做强,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对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大促进。因此,各地政府部门对于招商引资工作向来十分重视,往往派出兵强马壮的队伍四出活动,力求不断有所突破,可谓具

备了战略眼光。

但是,这一领域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例如,有的地方招来的项目或者技术工艺并不先进易引发严重环境生态污染,或者并不具备市场优势前景,以至于进退两难,上上下下,历经折腾而劳民伤财,没有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不少麻烦。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当然复杂,但与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人员欠缺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业务素质不高,尤其是受到腐朽作风侵蚀而有以权谋私违规行为,都脱不开关系。其中,借着招商便利,顺势途经旅游热地游山玩水,就是较为突出的不当表现。有道是:招商引资差事好,游山玩水乐逍遥;哪怕项目不恰当,无须自己掏腰包。

借招商引资之名大行公款旅游之实,此风不可不刹。安徽省政府下文严厉禁止这一现象,既合乎中央关于整顿“四风”的精神,也顺应广大群众的民意,理所当然。

# 京津冀一体化远非甩掉污企这么简单

■ 贾志勇 公务员

日前,北京市确定第一批外迁公司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目前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对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迁企业名单,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甄选。如果对接意向确定,由当地政府部门和北京市发改委完成对接。由于上述企业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尚未出现对接成功案例。(4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

从事实上看,化工、建材、铸造门类的企业,除了“三高”、“一低”,往往也吸纳着大量产业人员。将这样的企业迁出京,对于缓解北京市的交通、住房、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也算有利和有效。

但这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主旨或本身考量,都是不恰当、欠审慎、欠明智的,甚至带有愚弄和歧视意味。起码,即便“三高一低”企业离开北京市

而落户天津、河北,而实际上天津、河北两地距北京并不算远,诸如作为“一阵风的事”的雾霾威胁,与企业在北京市内或附近的天津、河北,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仅考虑北京的利益,一切仅以北京为着眼点,而简单地认为甩掉那些“三高一低”企业,就万事大吉,未免狭隘、短视和急功近利。此其一。

其二,北京市率先呈报的这第一批企业,处境会非常尴尬。这不仅限于企业利益受损,更涉及其产业工人的权益受损。如户籍优势、薪酬待遇等等,这都需要先有个令人认可的保障性制度垫底。此外,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些企业在面对天津、河北,恐怕会因为“三高一低”的先天不足,而丧失谈判优势。一旦难以实现对接,岂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味承受这一体化战略之殇。

其三,京津冀对接区域将遭遇空前的压力。因为迁出企业多是“三高一低”企业,对接区域首先要承受国家环保政策的管制,其次是当地群众的异议和抵制。一

句话说,北京市看不上、不想要的企业,天津、河北未必就看得上、很想要。如此,我们只有先对这些企业进行评估论证,对于一些难以维持,根本无法异地搬迁,再重新包装、上马的企业,我们还是趁早淘汰的好。如果执意实施,只会造成各级各地冒险、违心决策,要顶风违纪,甚至滋生腐败,尤其会伤害对接区域群众的切身利益,以致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个压力,对于京津冀等地来说,实在不可估量。目前尚未出现对接成功案例,足见各地在这些企业面前的定力足够强大。但这一情形究竟能维持多久,似乎很难说。

京津冀一体化,除了外迁企业,更要适当分解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职权功能,能够配套落户某地,才是首选。这才可确保三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实现科学、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否则,就会因为北京对天津、河北等地的歧视性决策,而让一体化陷入僵局。

